

《鹽鐵論》文本結構與意旨

聶濟冬

[摘要]《鹽鐵論》是桓寬根據鹽鐵會議記錄所作的再創作。桓寬雖述而不作，但通過文本結構、語言的有意安排，表達了強烈的儒家政治思想和對法家政治的反對，表現了經學中“微言大義”“美刺”意識。《漢書》言桓寬作《鹽鐵論》是“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從這個角度看，《鹽鐵論》當是廬江太守丞桓寬所作的一篇諫疏。

[關鍵詞]《鹽鐵論》；桓寬；文本結構；意旨

一、關於《鹽鐵論》的作者

關於《鹽鐵論》作者桓寬的介紹，漢代的文獻史料有限。班固《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云：“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①《漢書·藝文志》載：“桓寬《鹽鐵論》六十篇。”^②由此可知，《鹽鐵論》作者桓寬，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人。宣帝時期，由《公羊春秋》起家，被推舉為郎官，官至廬江太守丞。博學通識，善屬文。在漢代，太守丞，為六百石官秩，由中央任命，“是郡守府吏中地位較高的佐吏”^③。

舊題明代歸有光輯評《諸子彙函》中，將桓寬列為“貞山子”，認為“桓寬，東漢桓靈時為御史大夫，博極群書，著《鹽鐵》及《新論》。幼讀書貞山，因名貞山子”。但是，此論在時間、官職、著述方面都存在謬誤，故“貞山子”一說歷來被認定為不可信。

明弘治《鹽鐵論》本的刊刻者涂禎之名，在正史、板刻題記、題跋中，所記都略有不同。《明史》本傳中作“涂禎”。但在一些題跋、題記中寫作“涂楨”。史料中名不同者，也不是稀奇事情，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八“名與本傳不同”條即云：“古人名

【作者簡介】聶濟冬，1968年生，女，山東鄒城人。文學博士，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先秦兩漢文學史、學術史等。

①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2903頁。

②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1727頁。

③ 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下冊），齊魯出版社，1985年，第79頁。

字有與本傳不同者甚多……《後漢》謂‘虞詡字升卿’，碑謂‘字定安’。‘陳寔字仲弓’，碑謂‘仲躬’。《論語》曰‘申枨’，《史記》與漢碑皆曰‘申黨’。”^①《明史》本傳中作“涂禎”。禎，吉祥。《詩·周頌·維清》：“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毛傳》：“迄，至；禎，祥也。”《鄭箋》：“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楨，支柱，主幹。《詩·大雅·文王》：“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毛傳》：“楨，幹也。”《鄭箋》：“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之幹事之臣。”涂禎，字賓賢。從其字的意義上說，木字旁的“楨”似乎更相應些。但是《明史》作“禎”，又載其子名“樸”^②。從文化史避諱制的角度講，示字旁的“禎”更合情理些。但藏書家筆下的“楨”也當有緣由。

不僅桓寬的生平介紹相當簡略，就是《鹽鐵論》在漢代流傳、接受的狀況也不明晰。僅《論衡·案書篇》提到，“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③。

自明代開始，《鹽鐵論》被學者廣泛關注，版本日漸增多，主要有：明有弘治十四年涂禎刻本、嘉靖三十三年張之象刻本等；清有顧廣圻、張敦仁校訂本（見《岱南閣叢書》）、清光緒十七年長沙思賢講舍王先謙刻本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整理本有郭沫若《鹽鐵論讀本》、馬非百《鹽鐵論簡注》、王利器《鹽鐵論校注》等。民國時，還就葉德輝所藏“涂禎本”的真假問題，傅增湘與葉氏有過爭辯，最終是葉氏所言占上風，其所藏“涂禎本”入選《四部叢刊》。傅增湘為此一直耿耿於懷。“憶曩年滬館商定《四部叢刊》版行時，余語張君菊生，此書莫善於藝風所藏，迺真涂刻，海內無第二本，最為珍秘。其餘紛紛號為涂刻者，皆正嘉間覆鋟耳。而同年葉君彥彬起而抗爭，奮几抵掌，以張刻為僞，以涂刻為僞，以藝風所藏真涂刻為非真。高睨大言，歷詆張古餘、顧潤賓、繆藝風諸人皆為誤認，且謂彼輩皆受賣人給，世間真涂本惟吾家所藏孤帙耳。詢其藏本為何，則九行十八字，即余所斷為正嘉間本者也。余反復駁詰，再三推證，堅持不易其說，菊生亦為所劫持，於是舍繆本而用長沙葉氏藏本。余說既不售，惟屏息私嘆而已。今故人長往，青山白首，時動哀吟，即當日奪席雄譚，辯論斲斲，回思輒為腹痛。”^④

二、《鹽鐵論》的文本結構和意旨

《鹽鐵論》的文本結構具有有意編排的特征，語言具有強烈的傾向性，反映出桓寬尊崇儒家、批評法家的情感指向。

① [宋]王欽：《野客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05頁。

② [清]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第4985頁。

③ 黃暉：《論衡校釋》第四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1172頁。

④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4—285頁。

(一) 《鹽鐵論》的思想屬性

關於鹽鐵會議召開的目的，現有三種說法。一是修復說，《杜延年傳》云：“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明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① 二是陰謀說。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認爲是霍光奪權的手段之一。桑弘羊的資歷在霍光之上。“這是霍光在政策上要假借此次辯論來壓倒桑弘羊，亦即是壓倒外朝所承襲的武帝的戰時財經政策，以便作若干修正轉換的一種手段。”^② 三是中允說。田餘慶《論輪台詔》：“從鹽鐵會議的辯論內容看來，可以肯定，這不僅是由於私怨，而且也是出於政見。”^③ 從昭帝時期的政治窘境和社會危機看，鹽鐵會議召開的目的，以討論現行方針政策是否得當、是否可行，當合乎邏輯。由此看，田餘慶的中允說是允當的。

西漢建立初期，實行黃老之治，歷經文、景，國家進入了穩定發展階段。在武帝時代，國家邁進了相對高度集權、高度繁榮的門檻。盛世繁華，不僅得益於文景之治，而且應該歸功於漢武帝時期的政治、經濟政策的大體得當，這其中包括鹽鐵、榷酤、平準、均輸等政策的推行。歷史的車輪如果能繼續前行，自然是政策照舊。但現實困境，讓晚年的武帝及其繼任者左右爲難。武帝時代對匈奴的大規模戰爭，對疆土有穩定、開拓的意義，但經濟的重負，也導致民怨鼎沸，屢滋民變。《史記·酷吏列傳》曰：“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齒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綉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④ 至昭帝時，國困民乏的局面並沒有改善。面對這樣的經濟窘境和政治尷尬，朝廷需要尋找新的出路，需要對現行政策進行糾偏、更正。始元六年（前 81），昭帝組織了朝野對話，討論罷鹽鐵、榷酤、平準、均輸是否便利。宣帝時期，桓寬即根據此次鹽鐵會議記錄，創作了《鹽鐵論》。《漢書》載桓寬“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⑤。顏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⑥ 《鹽鐵論》的創作固然有鹽鐵會議的記錄爲藍本，但桓寬他的同鄉朱子伯關於鹽鐵會議的介紹，也激發了桓寬的著述興趣。《鹽鐵論·雜論篇》中言：“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

①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 年，第 2664 頁。

②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 3 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76 頁。

③ 田餘慶：《論輪台詔》，《歷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第 17 頁。

④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 年，第 3151 頁。

⑤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 年，第 2903 頁。

⑥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 年，第 2904 頁。

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① 在《鹽鐵論》中雜有的辯論雙方的形態、臉色等主觀性的描述語言，就可能來源於朱子伯的介紹。

關於《鹽鐵論》在目錄分類上，在明代以後，出現爭議。《鹽鐵論》宣揚的是儒家政治理念和理想。桓寬治《公羊春秋》出身，故《鹽鐵論》通篇雖有諸子爭鳴的痕迹，但終歸儒家旨趣。全書序言性質的《雜論篇》高舉儒家精神，為賢良文學的際遇不平而鳴，“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歷史上，通常將桓寬及其《鹽鐵論》視為儒家類人物和典籍。黃式三《讀鹽鐵論》：“漢世賢良方正、文學之士……然讀《鹽鐵論》譏重斂，譏酷刑，上敘唐、虞、三代，下引孔子、孟子在言，粹然一出於儒。”^② 自《漢志》《隋志》始，公私目錄亦常將《鹽鐵論》歸為子部儒家類。但明代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卻將其歸為史部食貨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此提出批評：“蓋其著書之大旨，所論皆食貨之事，而言皆述先王，稱六經，故諸史皆列之儒家。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改隸史部食貨類中，循名而失其實矣。”^③ 當下還有學者提出，《鹽鐵論》當歸為子部雜家類：“與其將本書歸屬於子部儒家類著作之中，不如將其與《淮南子》等作品等量齊觀，納入子部雜家類著作之中，也許是更為準確的。”^④ 此言有理，但非篤實。

在武帝晚期政治危機萌發的延續中，在儒、法相對的爭執下，昭帝時期鹽鐵會議的召開，具有撥亂反正的政治意義。但鹽鐵會議的結果，並非完全如儒家所願。宣帝時期，桓寬以所沾溉的儒家學術素養和政治理想，與鹽鐵會議中的賢良文學產生了精神共鳴。這種思想共鳴必然為《鹽鐵論》塗抹上厚重的儒家傾向。

（二）辯論雙方的政治訴求

鹽鐵會議記錄已佚。《鹽鐵論》是桓寬對漢昭帝時期召開的鹽鐵會議記錄所做的再整理。《鹽鐵論》保留了當時論辯的內容，從中可以辨析當時雙方的政治思想及劍拔弩張背後的政治訴求。

1. 政治策略

是從儒，還是從法？這是西漢中期政治道路的必選題。雖然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但是朝廷在思想上、政治上仍貫通外儒內法的策略。《漢書·元帝紀》載漢元帝為太子時，“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

^①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下，中華書局，1992年，第613頁。本文所引《鹽鐵論》原文，皆自王利器《鹽鐵論校注》，此下不再單獨標注。

^② 黃式三：《徵居集·讀鹽鐵論》，《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6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88頁。

^③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中華書局，1965年，第771頁。

^④ 王永：《鹽鐵論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4頁。

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① 這段材料揭示了西漢中期政治策略具有法家特性的事實。

秦政具有法家政治的符號特征，“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②。漢承秦制，官吏多為文法吏，這使得政治不可避免地具有法家的特色。這與儒家迥然相悖。西漢儒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討論秦朝的過失問題。《鹽鐵論》也具有《過秦論》的時代特征，賢良文學們與大夫們就此問題，展開了多層面、多角度的博弈。如《非鞅篇》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卻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論誹篇》文學曰：“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論功篇》文學曰：“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論災篇》文學曰：“以己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刑德篇》文學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偽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撲焦而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等等。桓寬的主張亦同，在《雜論篇》中其總結說：“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以周祚長久與秦世短命的比較，來闡發自己褒貶、揚棄的觀點。

大夫一方自然是針鋒相對，堅持秦政可行，如《非鞅篇》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奸偽無所容。”同篇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申韓篇》御史曰：“夫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強秦韓也。”御史大夫們亦以歷史說明法家政策的實效性。

由此可見，儒法之爭，不是賢良文學們與御史大夫們辯論的動機。他們激烈辯論的目的，更在於漢帝國政治方略的選擇上。

2. 外交政策

西漢最大的外患來自匈奴。自漢高祖遭遇平城之圍以後，西漢邊關壓力主要來自匈奴挑釁和騷擾。匈奴憑藉民族的強悍和游動性特徵，經常入塞擾民。所以《擊之篇》：“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為藩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漢初以來，朝廷屢次示弱，以和親的方式求得短暫的穩定。漢武帝時，衛青、霍去病的征戰改變了這種被動格局，但是並未完全制服匈奴。至元帝朝以前，匈奴仍是邊境的頭等大事。《鹽鐵論》中“匈奴”成了關鍵字，超過了“鹽鐵”的使用頻率。據統計，“匈奴”一詞在書中出現了 55 次，成為第一主題詞，超過

①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 年，第 277 頁。

②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 年，第 2369 頁。

了鹽鐵（出現 49 次）、均輸（出現 16 次）、酒榷（出現 5 次）。而且，在書中《憂邊》《備胡》《和親》《結和》等篇中，雙方都重點討論了與匈奴的關係、對策。

關於對待匈奴的政策，賢良文學們與朝中重臣意見相左。朝臣以為要備戰匈奴、堅決打擊。《本議篇》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擾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備胡篇》中大夫曰：“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賢良、文學們則強調應採取以往以德化人的策略和和親的方式，如《本議篇》：“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于外，百姓勞苦于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擊之篇》中文學曰：“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從歷史進程來看，賢良文學們設想的這種以德報怨的方式，是行不通的。王先謙《鹽鐵論序》中即提到，賢良文學們“至謂加德施惠，北夷必內向款塞，斯迂闊不達事情之論也。夫所謂以德服人者，有力而不輕用力之謂也，苟無力則德無由見，而人奚自服”^①。

3. 經濟政策

西漢建立之初，經濟匱乏，國家採取了以農為本、休養生息的經濟策略。文帝時，又下《開藉田詔》強調農業的重要性，“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②。儒生文士們積極獻言獻策，要求以農為本。賈誼《新書》：“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武帝時，東方朔《上除上林苑》規諭武帝重農，“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③。

對農業的重視，是農耕時代固有的經濟方略，所以《鹽鐵論》開篇《本議》一文之首，賢良文學們就直奔主題，堅持以農為本，“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而在武帝時期，商業發達，《史記·貨殖列傳》載：“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④所以大夫們對儒生的建議並不以為然，認為農、工、商、兵各業互為依傍，《本議篇》大夫曰：“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認為罷鹽鐵、均輸、酒榷、平準不便，並在《力耕篇》中進一步明確提到：“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① [清]王先謙著，梅季點校：《王先謙詩文集》，《虛受堂文集》卷五，岳麓出版社，2008 年，第 88—89 頁。

②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 年，第 117 頁。

③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 年，第 2850 頁。

④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 年，第 3261 頁。

賢良文學們與朝中重臣所談論的經濟政策，可歸結為為富民而實行的方式方法之爭。以農為本是儒家傳統思想，在《鹽鐵論》中，賢良文學們就力主以農為本，放開鹽鐵經營，事見《本議篇》《力耕篇》《禁耕篇》。而朝中重臣則對以農為本不以為然，認為不必非用本農、非是井田，以為各業均可富國，要“均有無，通萬物”（《通有篇》），實行均輸政策更可致富。而且他們從積聚財富、限制大資本、維護中央集權的角度，要求鹽鐵官營，故《禁耕篇》中大夫曰：“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

4. 選舉制度

漢代選人任吏，有軍功、任子、貲郎、選舉、察舉等選賢方式。選舉、察舉，是面向社會各階層招納有才德的人。漢文帝《策賢良文學詔》云：“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①漢武帝在元光元年《策賢良制》：“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②參加此次鹽鐵會議的賢良、文學們，也是由三輔、太常選舉而來。

文帝朝以後，商人階層也開始進入官場。在漢惠帝之前，商賈階層被嚴格限制入仕。但文景以後，商人群體漸成一個富裕階層。文帝時，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③。文、景以後，朝廷為富商大賈開“以貲為郎”之途，即“以家財多得拜為郎”^④。《漢書·張釋之傳》稱張釋之，南陽堵陽人，“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事文帝”。如淳注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⑤《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司馬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⑥。鹽鐵會議中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也是通過貲郎這條途徑進入廟堂的。鹽鐵官營後，朝廷又為過去經營鹽鐵的那些富商們打開了仕進之門。官吏中商人的比例增多。《食貨志下》：“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⑦

仕路不暢，自然引起了士人的強烈不滿。《鹽鐵論》中賢良文學們批評了選舉之外的軍功、貲郎等選吏方式，認為他們不合古制，堵塞了選舉之路，《除狹篇》中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

①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2291頁。

②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2495頁。

③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1132頁。

④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2529頁。

⑤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2307頁。

⑥ [漢]班固：《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2999頁。

⑦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1166頁。

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關於那些“戲車鼎躍”的人的出身，王佩詮以為“《除狹篇》‘戲車鼎躍’，均出閭里游俠子弟所為”^①。如此說來，《除狹篇》中批評的這些官吏都不是讀聖賢書出身的。

選賢任能是辯論雙方的共識。《毀學篇》中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賢，能者受之。”但是，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的焦點，集中在何種人可為賢者的問題。因為賢者典範標準的確立，意味着治國路徑的確定。賢良、文學們主張法先王，行仁義之道，《除狹篇》中賢良曰：“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固為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塗，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但是，朝中大臣以為儒術迂腐，不周世用。《刺復篇》大夫曰：“自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睹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遵道篇》丞相史曰：“晉文公謫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謫，所由不同，俱歸於霸。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在手握實權的權貴眼裏，法家在治國方面優於儒家、墨家，霸道強於王道，法治優於禮治。元帝以後，經生的地位頗有長足的進步。“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②

在鹽鐵會議後，關於選賢的標準問題，仍是一個常談的話題。宣帝時王吉上疏云：“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③直至東漢王充《論衡·程材篇》中還提到當時人們的看法：“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為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④由此可見，兩漢儒生與文法吏孰優孰劣之爭曠日持久。

綜上所述，《鹽鐵論》所涉及的主要內容，就是賢良文學們與朝中重臣圍繞武帝時期的政策進行討論，申訴各自的主張，辨別其在當下的可行性和正確性。爭辯的雙方各執一辭，文學尚復古，大夫講務實，形成了爭辯雙方各說各話的文章格局，故章太炎在談到《鹽鐵論》的結構時，認為“漢論著者，莫如《鹽鐵》，然觀其駁議，御史大夫、丞相史言此，而文學、賢良言彼，不相割切，有時牽引小事，攻劫無已，則論以離其宗；或

① 王佩詮：《鹽鐵論劄記》，中華書局，1958年，第33頁。

②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1253頁。

③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3065頁。

④ 黃暉：《論衡校釋》第二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533頁。

有郤如擊如罵，侮弄如嘲，故發言終日，而不得所凝止，其文雖博麗哉，以持論則不中矣”^①。實際上，在這種似乎各說各話的辯論中，雙方的指向都非常明確，王佩諍即言：“桓次公非不知窮通變化之理者，以欲迫駁桑弘羊輩假借變法之美名以行聚斂之實際，故寧循古耳，所謂夫言豈一端，夫各有所當也。”^②

(三) 《鹽鐵論》文本結構

《鹽鐵論》述古論今，內容龐雜，但文本結構錯落有致。

《鹽鐵論》十卷六十篇。全書在結構上，以第四十二篇《擊之》為界，分為上下兩部分。《取下第四十一》結尾曰：“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榷沽、關內鐵官。’奏可。”就此，鹽鐵會議辯論已結束。而《擊之第四十二》起首云：“賢良、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其後的內容是邊政、刑罰問題，與《取下篇》以前的經濟、任賢等內容多不一致。因為《鹽鐵論》上下兩部分內容的不協調，由此有了“臆造說”。此說由清人姚鼐發其端，其《跋鹽鐵論》：“又議《鹽鐵》自第一篇至四十一篇奏復詔可而事畢，四十二篇以下，乃異日御史大夫復與文學所論，其首曰‘賢良文學既拜，皆取列大夫’。按漢士始登朝，大抵為郎而已，如嚴助、朱買臣對策進說為中大夫，乃武帝不次用人之事，豈得多哉？昭帝時，惟韓延壽以父死難，乃自文學為諫大夫，魏相以賢良對策高第，僅得縣令，其即與此對者。與固未可決知，要之，無議鹽鐵六十人取大夫之理，此必寬臆造也。”^③針對臆造說的合理性，當下學者，如黑琨、龍文玲等提出了反對意見。^④

班固評價桓寬“博通，善屬文”。《鹽鐵論》的文本結構和思想意旨，即反映了作者極強的文字總概括能力和明確的思想指向性。

郭沫若認為《鹽鐵論》是“經濟題材的對話體歷史小說”^⑤。通常，將該書視為問答體的政論文。參與鹽鐵會議的賢良、文學有六十多人，官員包括御史大夫、丞相、御史、丞相史等，人物衆多，名字繁雜。在《鹽鐵論》中，桓寬將與會人員的名字隱去，簡要地概括為賢良、文學一方和御史大夫一方。在辯難問答中，將雙方的意見展現出來。該書每章節一般辯論三五個回合。以御史大夫一方發言為起始，以賢良文學一方發言作答結。雖然桓寬意圖表示其“述而不作”，但他在這種寫作模式中，是蘊含了深意的。《論衡·案書篇》：“兩刃相割，利鈍乃知；兩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子‘四難’，桓寬

① 傅杰編校：《章太炎學術史論集》，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9頁。

② 王佩諍：《鹽鐵論札記》，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87頁。

③ [清]姚鼐：《惜抱軒後集》二，《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7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59頁。

④ 參見黑琨《〈鹽鐵論〉後半部非臆造之作論考》（《甘肅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龍文玲《〈鹽鐵論〉四十二至五十九篇非桓寬臆造》（《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

⑤ 郭沫若：《鹽鐵論讀本》，《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7頁。

《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① 賢良文學的作答，是針對御史大夫的發問，是表達了桓寬的本意。所以，桓寬“總是把‘上仁義’的儒生的話壓在每篇的最後，隱然作為各篇的結論性意見，並把儒生的許多思想主題作為題目標出”^②。桓寬的本意，通過對文本結構的有意編排，自然地流露出來。

但此中也有特例，即《散不足篇》。《散不足篇》是以丞相發問“願聞散不足”始，以賢良一氣呵成的32個古今對比事情為節，直抒胸臆。全書的最後一篇《雜論》，是桓寬的心得總結，相當於該書的序跋，這是漢代散文的特點。王利器說：“古代子部諸書，有內篇、雜篇。鹽、鐵本論，致《大論篇》已畢，此如諸書之有內篇，至此，桓寬復敘述自己撰述此書之由，取與本論有別，故曰《雜論》，正如諸書之有雜篇一樣。”^③

鹽鐵之議，名義上是經濟問題之爭，但涉及了政治、社會、外交方面的核心問題，實是國是大討論。在辯論中，雙方反復詰難。從總體而言，在《鹽鐵論》中，賢良文學攻擊朝廷官員的言論，多集中在《非鞅》《毀學》《遵道》《結和》《誅秦》《徭役》《險固》《論功》《論鄒》《刑德》《申韓》《周秦》《詔聖》等篇中。朝廷官員攻擊賢良文學的話，主要集中在《刺復》《憂邊》《毀學》《褒賢》《相刺》《殊路》《頌賢》《遵道》《利議》《能言》《世務》《大論》《論儒》等篇中。

辯論雙方針鋒相對，言辭異常激烈。參加鹽鐵會議的文學，是由三輔新舉薦而來的布衣，他們的發言最為勁猛，將攻擊矛頭直接指向御史大夫及其推行的政策，甚至有人身攻擊之嫌。如《利議篇》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國疾篇》文學曰：“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厚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文學在語氣上，也是當仁不讓。《非鞅篇》文學曰“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句，王利器《校注》云：“《刺復》篇言：‘獨一公孫弘。如之何？’此文言：‘雖有十子產，如之何？’兩相對照，有以見文學語言之咄咄逼人也。”^④ 賢良比文學早一年征召入京。在辯論中，他們亦持儒家政治思想，但語詞相較文學而言較為舒緩。御史大夫就提到：“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土。’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失之事，故所以然者也。”文學言辭激烈，大夫一方也不示弱，《利議篇》大夫曰：“嘻！諸生闡葺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逾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

① 黃暉：《論衡校釋》第四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1172頁。

② 吳慧：《桑弘羊研究》，齊魯書社，1981年，第482頁。

③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下，中華書局，1992年，第614頁。

④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下，中華書局，1992年，第106頁。

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在《鹽鐵論》中，文學、賢良們在氣勢上，顯然更勝一籌。該書中常出現御史大夫一方被對方質問得默然不應的景象，例如，《相刺篇》：“大夫不說，作色，不应也。”《國疾篇》：“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刑德篇》：“大夫俯仰未應對。”《刺议篇》曰：“丞相史默然不對。”《大論篇》結尾：“大夫憮然內慚，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斂，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倏逢雨，請與諸生解。”

清人言漢儒治《詩》，不過美刺兩端。桓寬作《鹽鐵論》，貌似述而不作，但其通過對文本結構的編排、篇章的定名、描述性語言的使用等創作手法，其美、刺意識又昭然若揭。《鹽鐵論》字裏行間，都充斥着作者對儒家的支持和對儒生的贊揚。《雜論篇》中特意表彰了幾位與會的儒生，“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微，切而不燙，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並對賢良文學的意見最終“廢而不行”，表達了一種遺憾。贊揚的反面就是對朝政的批評、批判。曾有人指出桓寬所定書名《鹽鐵論》的用意，與司馬遷的《平準書》的立意是一致的。例如，金蟠刻本《自序》：“漢昭皇帝時，大夫桓氏著《鹽鐵論》若干卷，溯其叙列，則漢廷御史大夫與賢良、文學質難當時利敝而垂之竹帛者也。上自禮樂刑法，下逮農耕商賈，內則少府領賚，外及蠻、夷戰守，金籌石畫，駁辨稽參，靡不愷至而精核。所論匪特鹽、鐵也，獨舉鹽、鐵者，猶太史公綜貨殖獨書平準也。獨書平準，而四民俱困之形見；獨論鹽、鐵，而萬世蔽病之本晰，故有取爾也。”^①《鹽鐵論》沈延銓刻本之李元鼎《序》也指出了桓寬對時政的指斥，“予按漢隆時，尊尚文學，名儒彬彬蔚起，無論董相《三策》，娘娘可誦，即韋布之士，各抒所見，中有憤寄，昌言無隱，如桓氏《鹽鐵論》所載，類皆指陳時政，直詆公卿，不曲學以希旨，不徇俗以耽學，其一段苦心忠盡，直欲以文章爲政事，不徒炫采標華而已”^②。

在《鹽鐵論》中，桓寬反對法家政治，但對桑弘羊的評價，是在褒貶之中流露出惋惜之情。“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傳統上，對桑弘羊的評價歷來不高，多認為他是聚斂之臣。甚至在北宋熙寧變法中，司馬光、富弼、蘇軾等保守人物，還以“桑弘羊”比附王安石，反對變法。儒家通常是在道德高地的占據中，評論時政，立論高遠，但在復古尊禮中，難免會在實務方面陷於迂腐的泥淖。劍鳴盧主人《鹽鐵論新詮》就認為文學迂腐不實：“漢自高祖至武帝，百年之間，幣制屢

①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下，中華書局，1992年，第798頁。

②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下，中華書局，1992年，第797頁。

易，且雜然並用，使民無所取信，此誠亟須改革者也，然如文學所議（聽民鑄錢，與龜貝之屬同爲通貨）則適足以益其紛亂，直抱薪救火之談耳。”^① 所以，不能僅從儒家道義上，簡單地否定桑弘羊之流的歷史功績。

三、結語

鹽鐵會議內容林林總總，雖名爲鹽、鐵之議，實爲解決安邦之計。以此次會議記錄爲藍本創作的《鹽鐵論》，是對武、昭、宣時期政治走向，進行深刻評判和力圖做出影響的著作，彰顯了著作者的大是大非觀。雖然作者承襲了儒家“述而不作”的寫作傳統，但通過對文本結構的有心編排，對辯論雙方的傾向性的描述語言，清晰地反映出作者尊崇儒家的主觀意圖。

Yan Tie Lun Textual Structure and Idea

Nie Jidong

Abstract: The book *Yan Tie Lun* was a recreation by Huan Kuan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salt and iron conferences. Though this book is more elaborative than original, the textual structure and the deliberate arrangement of language insinuate intense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s and implies his opposition of the legalists' theory. The book shows its awareness to convey deep meaning with sublime words and to satirize as if to compliment. *Han Shu* said that *Yan Tie Lun* also searches for the truth to prosper the society and establish its own theory.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can say that *Yan Tie Lun* is Huan Kuan's suggestions as Satrap of Lu Jiang.

Keywords: *Yan Tie Lun*; Huan Kuan; salt and iron conferences; recreation

^① 劍鳴盧主人：《鹽鐵論新註》，臺灣《民國叢書》第七十五冊影印本，第9頁。